

中國小說史集稿

馬幼垣著



時報書系 265



15週年紀念
1973-1988

中南圖書公司

中國

小說史集稿

馬幼垣著

●時報書系265

新學
社
PDG

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時報書系 ㉔

中國小說史集稿

著者 馬幼垣
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三號
電話 三〇六八四二

TEL: 5-580280, 5-580288, 5-580289

YAU-SHING BOOK CO., LTD.
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0號8樓
經銷處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0號8樓
YAU-SHING BOOK CO., LTD.
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0號8樓
八月二十日
九月三十日
第十三四號

平裝新臺幣一四〇元
精裝新臺幣一八〇元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新學社
PDG

小說研究的點點滴滴 —— 代序

小學中學時期，很多人都有胡亂看些舊小說的經驗。「水滸」、「三國」、「老殘」、「西遊」、「紅樓」，多半是撇開功課不管，挑燈追讀，或是上課時壓在課本下偷偷看的，要不然就是用來支配無所事事的假期。

我第一次接觸傳統舊小說，確切時間已記不清楚了，大概是小學三、四年級（約一九五〇—五一年間）時的事吧，當時的情形却仍歷歷在目。香港光復，到那時候，已有好幾年，漸次穩定，加上大陸游資的大量輸入，市面經濟呈現新景象，新的民娛事業遂應運而生。原來僅有的香港電臺，是官辦性質，節目太公式化，廣播也不是全日的，很明顯地有設立第二臺的必要。這就是「麗的呼聲」（Redifusion）的有線廣播系統，節目內容和風格，跟香港電臺有顯著的分別，收費又廉，開始的幾年大有壟斷香港廣播事業之勢。當時「麗的呼聲」

HW 4/29/01

最吸引我的節目，是每週晚上兩三次的「水滸傳」講述，說書人是陳弓。此君說書技巧高明，繪影繪聲，使聽衆有親歷其境的感覺（好幾年後，香港才有電視），而且他的學問也相當好，遇到官名、文物、地理、制度，甚至版本分歧，均略作解釋，聽來更是津津有味。可惜節目排在晚上九、十點鐘，小學生熬不了夜，臥在床上，半睡半醒的聽，僅得一個輪廓。後來在五年級的時候，從一個同學處借到一套「水滸」，是七十回的坊本，暑假的第一個月一口氣看完。那時一定是腦子空空，一百零八條好漢的姓名和綽號竟能背誦（現在記得的不過半數），直到現在，「水滸傳」還是我熟悉的小說。這也是我和中國傳統小說結了不解緣的開始。

中學開始的頭兩年，只有「三國」和「老殘」兩部小說，慢慢的看過一遍。到中學最後兩年，興趣改變，從對任何功課都不大起勁，轉而對中文產生濃厚的愛好，主要是由於國文老師連寶彝先生的諄諄善誘。他視書籍重於一切，單身漢，租一斗室，室內全是書籍，只有從書堆間找空隙才能走動。每次去探訪，他總要自床上撥開幾疊書，不然兩人連坐下的地方也沒有。書籍他始終照購不誤。週末他帶我去買書，經他介紹和書商打交道，講折扣，漸漸領略到購書和藏書的樂趣。

五十年代，甚至六十年代初期，書籍取價實在便宜，一部線裝的影印本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」，不過港幣二元六角，中學生省兩三次中飯就夠了。（如果現在還能從書商手上購得此書，非索價港幣四百元以上不可）。開始兩三年，確是亂買亂看，「尚書大傳」、「禹貢集解」、「司馬法」、「本草品彙精要」等毫無關連的書，以至近人著述，只要口袋裏夠

錢，很少作別的考慮。正在小學五、六年級的泰來也參加一份。到一九六二年秋季我進港大中文系時，兄弟倆合起來，藏書過兩千冊。

這種買書的勁，保持了二十餘年，直到最近我才比較少買一點。好些書定價着實太貴，連本錢極少的翻印書及盜印書亦如此；歐洲書更是買不起，一本法國或荷蘭出版的書，定價三、四十元美金是等閒事；英國書也好不了多少，索價不到美金二十五元是奇蹟。購書至今，也到了有書無地方放的地步。倒是舍弟還頗有購書的勁，雖在圖書館服務，用書不能再方便，他還是喜歡買自己要用的書。

言歸正傳，大學前，盲人騎瞎馬般地摸索了四、五年（中學畢業後，唸了一年大學預科班，再當了兩年政府文員，才進香港大學），開始弄清了門徑和嗜好所在。我的興趣主要在三方面：小說、中西交通，和清季史（特別是海軍史）。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不錯，大學三年（港大用英國三年制），功課相當輕鬆，第二年更是全年沒有考試（同學稱之爲honey-moon year），長駐圖書館，給我很好的讀書機會。三年間，寫了幾篇研究文字，交學報發表，小說、中西交通史、清季史三方面都有一點。收在這本集子裏，講太谷學派和「京本通俗小說」（和泰來合作）兩篇，便是大學時期的作品。

中文系同學，往往以能用文言寫作爲榮，我最初寫的幾篇，特別是講歷史的，均以文言出之，太谷學派一篇可說是代表。這篇討論「老殘遊記」作者劉鶚的思想背景，現在不改寫，收在集內，算是求學過程的一種紀錄。熊龍峯一篇，雖然在來美後三年始發表，底稿早在港大二年級時已寫好，初稿用文言，來美後抽空以白話改寫，才寄清華學報。最近看到幾

篇俞平伯早歲論「紅樓夢」的文章，有些也是用文言寫的。這種心理，可說是一種現象。

港大三年，時間多半花在歷史上。直至目前為止，港臺各大學中文系還沒有好好的設立小說課程，更遑論十七、八年前。港大諸師，不乏碩學之士，特別是饒宗頤先生，更是絕世英才，其淹博淵深，不亞於陳寅恪。但是他們對小說不感興趣，清季史也不屬中文系範圍（那是歷史系的課程），只有中西交通史是饒宗頤和羅香林兩先生均有興趣的（課是羅師開的），我花在這方面的時間自然較多。不過，因為中國歷史課要寫畢業論文，我選了「清季北洋海軍研究」為題，隨心所欲地整理多年來集得的史料和日本資料，竟一發不可收拾，寫了近十萬字（稿仍在港大中文系）。時間既然這樣分配，大學時期讀的傳統小說和有關小說研究的資料，並不算多。

港大畢業後，來不及參加畢業典禮，便來美進耶魯大學研究院，算來已是十五年前的事。這些年來，在美由求學至執教，讀書的機會可真不少。讀書的方便，在美國尤勝於香港，要找一般舊籍沒有什麼困難，近二、三十年的書籍更是齊備，幾間主要的圖書館最近還通過特別安排，有系統的購置在香港也看不到的刊物。遇到本校圖書館沒有的書，可用互借制度向別館商借，除善本書外，限制不多。平時藉開會和旅行，順路訪書的機會，每年總有一兩次。如此種種方便，對我這個治學先講資料的人，實在很重要。

雖然如此，這十多年來讀書却不似在港大時的無拘無束。無他，在美求學免不了要應付各種課程報告，這種練習多半太形式化，限時限刻交卷，不夠深度，勞而無功，時間和讀書的選擇則隨着受操縱。寫畢業論文時，更是需要全神以赴，分心不得。這種情形也足以解釋

爲什麼不少初入行的同事，爲了應付生存所繫的出版數目，只有擴充畢業論文，甚至一氣化三清，先在學報上分章零沽，以後又再合爲一書。等到這張皇牌派了用場，一旦混過長俸，免不了好幾年交白卷，甚至有從此封筆的危險。

我在執教之初，不必愁出版數目。讀書的範圍，備課以外，影響力最大的是接二連三的學術會議，東一題，西一題，很難成體系。開會是現代學術生活的一部分，對於居處太平洋中央的我尤其重要。舊雨新知，藉此聯絡感情，交換消息，沒有更方便的了。不單如此，開會亦是我搜集資料的好機會。

記得一九七三年暑假，爲參加東方學會議，第一次去巴黎。許多與會者，醉翁之意僅在花都名勝，會場去兩三次便算了。我亦如此，但沒有興趣去逛博物館，看名畫，大部分時間花在國立圖書館的東方稿本部。閱覽室內並不擁擠，看書的多是當地人，我那一週內所看的僅限於明清小說，特別是那套馳名遠近，僅存一卷多，可能是明代福建書商余象斗印行的「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」，古色古香，愛不釋手。更因爲室內所採用的取書制度和佈置，看似數十年如一日，不覺想起鄭振鐸在一九二七年七、八月間在此讀善本小說戲曲，他的記錄是中國俗文學研究史上很重要的一頁。聯想起來，思古幽情，油然而生，看書更是起勁。三年之後，舊地重遊，再到國立圖書館讀書一週，離鄭振鐸在此做開墾工作，差點便半個世紀，小說研究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確有長足的發展，俯首檢讀他當年看過的珍籍，禁不住景仰的情懷，一切長途跋涉，舟車勞頓，都得到了報酬。

不管開會是否純粹爲了找旅行藉口，論文還是要寫的。一般同行爲開會所寫的文章，可

分兩種。一種是隨便寫六、七頁提要式的話，到時引伸一下，打發二十分鐘左右，任務遂告完成。這類應酬文章，以後多半不會擴充正式發表。另一種是利用開會日期的壓力，一口氣把文章趕出來，註釋落齊，開會時僅摘要唸唸，回頭把原文修改一下，即可發表。我應付開會寫文採的是第二種辦法，這集子裏談中國講史小說、話本裏的俠、和說書起源三篇便是這樣來的，其中說書一篇就是為巴黎東方學會議寫下的。

歐美的漢學會議，當然是洋玩意，中國人參加也應該尊重人家上百年的傳統，以英法語為講述媒介。對於較大規模的亞洲學會議或東方學會議，中國研究僅佔會程的一部分，自然更應力求語言上的統一，否則各說各的話，大會無形瓦解。換言之，剛剛說過的三篇，本來不是用中文寫的。集中還有討論「龍圖公案」版本演變和大連舊藏小說兩篇，同樣是先有英文原稿的。至於翻譯的經過和譯者，留在後面再說。

以上交代過的八篇，可說是學院派文章，幾行一注，注不嫌詳盡，介紹金瓶梅新資料一篇（並附錄），不算長，只有短注幾條，性質仍屬相同，和上述八篇彙合為本集的第一部分。另外加上較通俗的三篇，勉強充作專題討論。這十二篇按寫作先後排次，譯文則以原作日期為準。

第二部分連「導言」在內的十二篇，全是為報紙副刊寫的「小題小做」。寫這些短篇的理由，「導言」中已有說明，不必再贅。這部分也是按寫作先後排列，例外是「臺灣的外銷書和內銷書」，這篇寫在「導言」之前，而「導言」是和評郭著小說史及「耶蒲緣」兩篇同時發表的，所以臺刊書那篇就放在「耶蒲緣」之後。

這兩部分所收各篇，除了明顯的錯誤及三幾處的文字修飾，其他不作改動，以存舊觀。需要補充的地方，則加補記於文後。

自對小說有興趣以來所寫文字，大率收入集內，剩下來的僅四、五篇只有英文原稿的東西。我的興趣所在和治學方法，這長短二十餘篇可作為代表。所謂「治學方法」，說來言之過重，基本上不過「積聚」二字。太谷學派和「京本通俗小說」兩篇的補記，可略為說明積聚的過程。

大概是中文系的本色，早期的文章幾乎是純考證性質，以後隨讀書興趣的變更，也試着做分析和批評，考證文章偶然還是寫的。我對考證和批評兩途的觀感，在「文學批評、翻譯與考證」一文的開頭已略為申說。考證也好，批評也好，各有長短，應該互為發明，不必相詆。在前輩學者當中，夏志清先生以文學評論著稱於世，他熟讀西方文學，但不亂套西方理論，不作虛浮譁衆之說，更難得的是，他自己雖鮮做考證，却尊重考證，樂於採用別人的考證成果，這是他過人之處。其實考證和批評只是研究角度的不同，如何做考證而不致附會牽強，不致支離破碎，如何做批評而不致理論重於一切，不致作無根之言，才是正確的治學方法。

我不是唯方法論的人，為學不先立法門，不獨宗一家一派之說，但覺得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，掌握材料該是基礎的步驟。材料不限於原始資料，一切重要的近人著述，不論觀點如何，以何種文字出之，均應先有系統的掌握。缺原始資料，研究難做到正確和徹底；不充份利用前人的成績，則難免走冤枉路，甚至去摸索早已解決的問題，還不一定找對答案（集中

所評的李輝英小說史，正代表這種情形的極端）。說來也是我國執之處，遇到找不到的資料，不管一手二手，寧可把文章放下，等上十來年，待資料齊了再說。反正可寫的題目有的是，不必空等。

這一點，可以用劉鶚和他的「老殘遊記」及續作做例子來說明。要討論「老殘遊記」而不先弄清楚劉鶚的思想和為人，以為可以就書論書，缺失顯而易見。劉鶚的思想主要有兩方面，一是他的服膺太谷學派之說，二是他對清末社會政治經濟，以及中國前程的觀感。前者可從太谷學派的史事和學說入手，後者除了「老殘」一書外，還得從劉鶚的其他著述，和他一生行實交誼中求印證，二者均是就材料說話的。

關於太谷學派，本集內已有解釋，但止於基礎性的整理工作。劉鶚的生平，以前也花過點功夫。那是一九六三年夏天的事，剛在港大唸完第一年。因為將來的畢業試全以二、三年的課程為範圍，升二年級前的暑假最自由不過，加上港大的暑假歷時四個多月，漫長的一個夏天，可以痛痛快快地讀點書，就決定寫一篇劉鶚年譜。

當時見到的劉氏年譜，只有蔣逸雪的一種，稱為年略，是「老殘遊記考證」一文的附錄，該文初見於東方雜誌四十卷一期（一九四四年一月），後收入臺北世界書局「老殘遊記初二集及其研究」（一九五八年）內。這份年略，頗記生活雜事，但劉鶚在政壇上的活動，如他如何當賣辦，興洋務，參加庚子之役後京師的救濟工作等等，可以洞識他的思想、立場，和人生觀的地方，着墨反而不多。後來在魏紹昌編的「老殘遊記資料」（一九六二年）書中，看到蔣氏的修訂稿「劉鶚雲年譜」（原刊一九五九年），長五十多頁，視前稿增出很

多，但注意力仍是在生活雜事。其實劉鶚是一個在政海、學界、商場，和實業圈子裏浮沉了幾十年的人物，在昔日的檔案、雜誌，和報紙裏，散存有關於他的史料很多，如果我們相信劉鶚在「老殘」一書中表白他的襟懷，甚至含有若干自況成份的話，這種基本的傳記整理工作是不能不做的。

一則因為資料確是縱錯雜陳，特費時間，自己又缺經驗。二則因為好幾個重要問題，以資料缺乏，無法解決，例如在庚子辛丑兩年劉鶚參加的京師救濟工作究竟是怎樣一回事？當年一個暑假下來，寫了兩、三萬字，年譜僅具大綱而已。到了現在，仍沒有機會再重整舊稿。部分是時間問題，老是有更急切的事擺在眼前，部分是因為當年找不到的資料，一直沒有找齊。

庚子救濟事件，真相如何，對瞭解劉鶚，十分重要。一般講述「老殘遊記」的著述及中學課本選讀中所附的題解，均告訴我們：劉鶚在庚子拳變，清廷西狩後，挾資入京賑濟，會太倉為俄軍所據，歐人不食米，遂賤價購得，糶諸民，民賴以安，而劉卒以私售太倉米罪流放新疆死。這種說法，沿用既久，幾乎不容置疑。提異議的不是沒有，除了政治性的漫罵外，始終僅得阿英一人。

阿英的「小說二談」（一九五八年）是大家所熟悉的書，裏面有一篇「庚子聯軍戰役中的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」（原作於三十年代），徵引兩種稀見的原始史料：一九〇七年中國救濟會刊行的「救濟文牘」，和救濟會負責人陸樹藩的「救濟日記」（一九〇一年）。阿英的結論是：「鐵雲在賑濟工作，以至購放太倉粟問題上，確有不少錯誤，甚至於可以說是嚴

重的違反愛國主義原則的錯誤。」

不是我們應該懷疑阿英的判斷能力，究竟這樣嚴厲的指控，有細讀這些證據的必要。可惜此二書太罕見了，阿英不過抄錄了幾條，後來蔣逸雪在「劉鐵雲年譜」內引錄過「救濟日記」，引文竟有出入。最令人煩惱的是，文史哲一九六二年一期（二月）及一九六四年六期（十二月）刊出嚴薇青及尺松的兩篇文章，二者均轉用阿英的引文，怎料結論是相反的；一人以爲劉鶚此舉功多過少，另一人則以爲劉鶚簡直是賣國叛徒。我們唯有重新檢討這些史料，才能分辨是非。

我隨時留意這兩部書的下落，前後近二十年，香港、臺灣、美國各圖書館都沒有（歐洲的幾間主要圖書館，我僅草草查過，不敢確定）。找資料，苟有恒心，天壤間要是尚有存本，早晚會找到的。一九七七年夏天，終得償所願，在日本京都看到了「救濟文牘」，劉鶚和救濟會間的來往信件，確保存了不少。另一種，「救濟日記」，去年十一月，在踏破鐵鞋無覓處的情形下，也給我碰上了。

有了這些資料，我還是不敢下判語。在「救濟日記」裏，陸樹藩說出參加救濟工作的尚有陳季同和嚴復。這消息真是峯迴路轉，柳暗花明。急急查檢王蘊常的「嚴幾道年譜」（一九三六年）及王枋的「嚴復傳」（一九五七年），二書略記嚴復在庚子年間參役救濟之事，皆以陸樹藩的日記爲據。

陳季同是福州船政學堂首屆留歐的海軍學生（我對海軍的興趣，竟和小說研究連上了關係），後來還擔任過臺灣民主國的外交事務。嚴復更不用介紹了。他們大有留下紀錄的可

能，或者足以說明劉鶚究竟如何在京師辦理救濟，有無發國難財的行徑等等。

幾天的興奮，還未平復，忽然看到中國歷史博物館刊創刊號（一九七九年）的廣告，列有「嚴復辛亥日記」一文。嚴復確是有日記的，辛亥和庚子相隔不過十一年，這事自然應該追查下去。等了好一陣子，一直到前兩天我才看到這部期刊，原來嚴復的日記僅存一九〇八、一九〇九、一九一〇、一九一三、一九一四、一九一六、一九一七、一九一八、一九一九、一九二〇各年的，共十年，沒有庚子亥丑兩年的。不過，在嚴復其他的紀錄裏有沒有可用的資料，還是要詳檢後才能知道，待我澄清了嚴復和陳季同這條線索，希望能夠着手討論劉鶚如何辦救濟的問題。

研治「老殘遊記」的困難，不限於劉鶚思想行實的奧晦，該書也不是毫無問題的。遊記初集二十回還算好，市面流通的本子大多可用。二集和外編，則疑點重重。初二兩集在主題和內容上的不協調，便是一例。在未查清楚以前，「老殘遊記」的討論，最好不要把二集及外編包括在內。

我第一次讀「老殘遊記二集」，是收在「老殘遊記初二集及其研究」的四回，比一九三五年之上海良友版少了兩回。「老殘遊記」自經胡適諸人的提倡，中學課本的選收，加上書中「北拳南革」預言的誤會（遊記初集成書於義和拳事件之後，南方革命事業已明朗化，自然不是預言），三十年代，有過一段洛陽紙貴的日子，請劉氏家族公佈續作各回的請求，亦越來越懇切。可能是爲了奇貨可居，劉家（特別是劉鶚的四子大紳）却頗不願示人。其他遺稿，家族亦自秘，弄到天津大公報「文學副刊」的主編，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五日該報，登

出劉鶚五子大經在津的地址及他藏有遺稿的消息，企圖用輿論來逼他們公開各種未刊稿。

在同一年，劉大經曾以二集副本交上海蟬隱廬書店刊行，是否因輿論的壓力，不得而知，却以劉大紳之反對作罷。蟬隱廬的東主是羅子經（即羅振玉之弟羅振常），羅劉二家爲世交，復爲姻親（劉大紳之妻即羅振玉長女），大紳之兄大縉（鶚三子）且在此供職，態度尙如此，其餘不必說了。次年，劉厚源（大縉子，即良友版上所說的劉鐵孫），復與劉大紳商量三集出版事，大紳不許，厚源後商於其父及其叔（大概是爲良友版寫跋的劉大鈞），遂以彼等之剪存本交林語堂出版，這便是六回本的良友版。遲至六十年代初，因大紳子厚滋、厚澤的提供，我們才能夠讀到二集七至九的三回。

這樣的刊行經過，暗示家庭糾紛外，對於二集本身的真僞不免投下陰影。未曾確證它不是僞書以前，我們寧可採存而不論的態度。

要探討此書的真僞，有兩辦法。一是分析初二兩集的語法，看看是否出自一人之手。語言文法之學，對我來說，是最棘手的學問，自愧無法應付。不過，以高本漢（Bernard Karlgren）的獨善此學，晚年嘗用語法去探求「紅樓夢」後四十回的作者，也沒有把問題解決。單靠文法分析，看來並不是最理想的法子。

另一辦法，是追尋二集的原刊本。劉家各人，異口同聲，說二集當初是逐日登在天津日日新聞的，劉大紳還說是一九〇七年的事。只要找到當日的報紙，一切都好辦。但是七十餘年以前天津的地方性報紙，假如天壤間果真尙有所存的話，真是莫大的奇蹟，故始終不敢寄以奢望。

一九七七年在京都訪書時，看到出版不久的野草第十八期（一九七六年四月），內有檜本照雄「天津日日新聞版老殘遊記二集について」一文，說京都大學藏有此書。我當時即在京都，沒有不立刻追查之理。索書一觀，驚喜莫名，原來竟是用當日的報紙釘成的。每頁紙在當中對摺後裝釘，紙背全是分欄小廣告，正面版心也有廣告，每頁都注明是天津日日新聞的第三頁，顯然是每天加印，彙合成冊的。二冊共收二集一至九卷，每卷一回，偶有缺頁，第一回正文前有序言。因為是逐日登在報紙上，日期記得很清楚，起七月初十日，訖十月初六日，還不到三個月。年份雖然沒有注明。但第一冊的封面有「丁未莫冬既望訂」字樣，丁未即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時距劉鶚流放新疆尙有一年，和劉大紳所說的配合。有了這種實物，才算是鐵證。除非另有更確切不移之據，證明這九回不是出於劉鶚之手，二集的真偽問題是可以不必再置疑了。

但這不等於說連外編也澄清了。外編是在「老殘遊記資料」首次公開的，不分章節，排印成九頁半，並附照片兩幅，是手稿的第一頁和第七頁。其中第一頁的照片，早見於一九五二年謝迪克 (Harold Shadick) 的英譯「老殘遊記」(*The Travels of Lao T's'an*)，大概是他在三十年代訪劉大紳時拍下來樣本。按字數計，手稿大約有二十頁紙。雖然現在還看不到整份手稿，這兩張照片却可以幫助我們決定外編的真偽。

以前不是沒有人懷疑過外編，太田辰夫在收入中國語學研究會關西支部所編「中國語と中國文化」(一九六五年)一書內的短文「劉鶚」，便斷言外編非出自劉氏之手，可惜他沒有提出任何佐證。正面討論，當首推樽本照雄的「老殘遊記外編は偽作か」，啞啞，五期(一

九七五年十二月)。他申述畢樹棠在「小說瑣誌」，文飯小品，三期（一九三五年四月），所提供的線索，以爲外編的著作權應屬於程紹周。樽本照雄還引田原天南所編「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」內的小傳，說明紹周是字，原名是程恩培，安徽阜陽人，爲羅振玉女婿。

這些資料都有待補訂。劉鶚、羅振玉、程恩培三人是同輩，程爲羅婿的可能性不高。按羅福頤「先府君行述」所記，羅振玉有三女，長女適丹徒劉大紳，次女適阜陽程傳鑑，三女適海寧王潛明（即王國維的長子）。程傳鑑即程恩培子。程恩培也是太谷學派中人，和劉鶚亦爲姻親，鶚以女妻程子百年（見蔣逸雪的「劉鐵雲年譜」）。有此種種關係，程或因一時順興所至，撰「老殘遊記外編」，不是沒有可能。

要解決這問題，還可以利用筆蹟。上述那兩張手稿照片，除了重見的字，單字約共三百一十個。要是能夠找到足夠的劉鶚筆蹟來作比對，自然真相大白。外編如果不是劉鶚作的，他怎會親筆抄錄一次？找劉鶚的墨寶，有一線索，清末的有正書局（著名的戚本「紅樓夢」，也是這家書局刊行的）出版過相當數量的碑帖，其中偶然附有劉鶚所題序跋識語之類。另外，劉鶚各種著述的原刊本往往有寫刻序跋。這些年來，這兩類材料合起來，我搜集了長短二十多款，合計的單字已不少。我希望再多找一點，才做比較。譬如說，成爲劉鶚殺身之禍的「劉熊碑」，至今未見，裏面諒會有他的親筆題記。

用劉鶚諸事爲例來說明我如何處理小說研究，竟成了專題報告，囉嗦極了，不外企圖解釋上面所說的「積聚」二字而已。我到今日還沒有真正研究過劉鶚或他的「老殘遊記」，曲折折的路確走了不少。這並不是孤立的例子，我所寫的文章多數經過這種點點滴滴的歷